

面對面採訪 真實的故事

金庸題詞



第 1 冊

吳祥珉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面采访 真实的故事

ISBN7-80607-535-6/I·229

I.面…

II.吴…

III.纪实—新闻—中国

VI.425

面对面采访 真实的故事

©吴祥珉

封面题字:金 庸

责任编辑:潘自强 晓 宁

封面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6 字数:400千字

版 次: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7-80607-535-6/I·229

定 价:28.00元(全二册,本册1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鲁 平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为回归，白了头，鲁平细说从头…… 2

罗康瑞 香港瑞安集团主席

●海鸥约纳堂…………… 22

陈佐洱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无缘政治却政治…………… 33

方黄吉雯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安达信公司国际行政局委员、中国及香港地区董事
副总经理

●白领丽人 勤于己 勤于人…………… 44

刘汉铨 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港进联主席、香港刘汉铨律师行律师

●情从缘生…………… 56

霍英东 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霍英东集团董事长

●吃得苦中苦，方为…… 66

邬维庸 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行医者真性情 乐天知命邬医生…… 83

李伟庭 全国人大代表
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助理兼社工部部长

●新华分社里的香港人…… 93

王敏刚 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刚毅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 104

王凤超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叫我老王好了！…… 116

梁振英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香港梁振英测量师行董事总经理

●很自信，但信奉自食其力…… 133

李家祥	香港首届立法会议员 香港李汤陈会计师事务所首席会计师	
	●不群不党行中间	143

成绶三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	
	●学而后知不足，行而后知更不足	168

王英伟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求变 求新 走出新天地	178

李泽添	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	
	●与生俱来之缘	201

李鹏飞	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电子专家	
	●忧乐天下事	214

董建华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董建华	226

后 记		242
------------	-------	-----



鲁 平：

回过头看我这辈子，我这个人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指高官），绝对不适合！因为这工作太复杂了，我这个人有点性格，有的人很怕我，但我是很有感情的人，一个有感情的人，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不适合做政治工作。

为回归，白了头， 鲁平细说从头

鲁平小传

1927年9月生于上海，四川省阆中人。

从小在上海读书，中学在英国人创办的雷氏德工业专科学校就读。

1947年毕业于美国人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毕业后先于上海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现中国福利会）工作；后于1952年至1966年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任编辑，后升任副总编辑。

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十二年。

1978年参加筹组国务院港澳办工作，一直工作至1997年7月，历任港澳办秘书长、副主任、主任。

1982年任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中方代表团成员；198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

1993年7月任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96年元月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1997年7月退休。

他是最敬重的中国高层官员之一。

我敬重他的才学、品格、风度和为人。

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港澳办、认识原主任鲁平，还得从头细说。

七八年前，记得是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中央电视台直播，我正好在广州，很偶然于无意中看了全过程。

印象极深是两个多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他手不拿讲稿，面前也没摆笔记本，直接面对百多号中外记者，侃侃而谈香港情况。对香港过去、现状、将来情况之熟悉与预测，直让我觉得是刻在他脑子里。

对记者毫不客气的提问对答如流。

本来口才了得，不拿讲稿发言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那是发生在多年前的中国。记忆所及，在这种大型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领导人不拿讲稿讲话在当时我是第一次见到。

从此，我知道了我国政府有负责港澳事务的部门——国务院港澳办；

从此，我知道了鲁平其人。

我曾是他的部下

我惊讶世界上众多事情中的许多巧合，直如讲故事般令人折服。

哪曾想到若干年后的一天，我会在他率领下工作。我庆幸、我开心，有机会目睹他的风采、有机会学习他的工作作风。

我似乎是糊里糊涂进了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秘书处，直至1993年7月16日预委会在北京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方知鲁平任

预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除预委会工作外，还主管秘书处工作。我在香港通讯处工作，间接成了他的部下。

我极珍惜在预委会、筹委会秘书处的一段不算太短的工作时间。

站在你面前的、活生生的鲁平，比电视上见更显风采；至于对他工作、作风、性格的感受，在近三年里，感觉是直接的，虽然他一些方式方法我并不赞同，但对身居要职的鲁平所做的一切，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他性格中的耿直、真诚与不屈不挠，而这恰恰正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的可贵之处。

1997年对香港人、对港澳办，乃至对国家都是特具意义、绝不寻常的一年。

5月即将过去，6月眼看到来，采访国务院港澳办其时在位的主任鲁平之计划眼看要泡汤了。无奈中我也直埋怨自己：香港回归在即，仍死抱着非采访鲁平主任不可的愿望，简直就是奢求；回归脚步声近，主管香港事务的国家主要官员，他的时间似乎怎么都挤不出来了。

可我又不甘心，采访他是我在香港开始写人物专访之初就有愿望。我在香港，他在北京，只能靠信函、电话来往的争取，偶尔有机会赴京，抓紧时机当面直陈采访要求，他口头答应了两次以上，且凭直觉告诉我，他是位恪守信用的人，答应了的事不会轻易说“不”。

认定了的事于我，也不会轻言放弃。经大半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不懈争取，已届5月尾时，我也动摇了，几乎想放弃了，然确实不甘心，心想：再争取最后一次吧！

又是言辞恳切、句句真情剖白、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能被打动之信，以最快速度传真往北京。

5月30日，接主任秘书刘振东先生传真：“采访鲁平主任的时间已定为6月5日下午三时，届时请来……”

我简直不相信是真的，半晌说不出话来，长长地舒了口气，真正地高兴透了。马上准备，告知北京下榻酒店、联络方法，匆匆赴京。

万分庆幸有这最后一次的争取，采访鲁平为我数十年记者生涯增添了最重要的一笔。当时我想：在预委会、筹委会阶段，若不能采访他，留下一段历史记录，我将遗憾非常。

留给历史的采访

待我真正入坐主任办公室，面对鲁平时，直截了当告诉他：“回归在即，你忙得不可开交，我要问的问题只有一个：请谈谈你多年来从事港澳工作的体会，包括回顾与展望；及回归后港澳办之角色。我不想为你定什么题目和框框，总之你想说什么，我就写什么，好吗？”

他沉思半晌说：“我不知从何讲起。”是啊！七十年的人生路，甜酸苦辣、千头万绪，岂能一时半会儿说得清？本来，离回归仅二十多天，中国主管港澳工作的最高官员，此时，正一门心思集中于回归大业；此刻，一切工作均围绕香港回归；此际，回归的具体事务已摆上议事日程。却让我这执著于回归前采访他的记者闯了进来，他的思绪、他的回忆会让我从眼前忙得团团转的日子拉回到他现时极有可能不愿回顾、不愿触及之往事中。

双方原定好采访时间为四十五分钟至一个小时，对此，我已谢天谢地。原想：他只要给半个小时已是万幸了。好！抓紧时间。

绝对没想到采访了三个多小时，也许他的故事太动听，也许我的采访太投入，以致不知时间已匆匆流逝，看错了手表上的时间，以为时间才过了一个多小时。

猛地听他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我们再谈一刻钟好

吗？”我再看表，怎么搞的，竟过去了三个多小时；是呀！点算录音带，正在转动的已是第二盒带子。待证实后，回过神来，几乎乱了方寸，内疚非常。我意识到自己不仅占用了他的宝贵时间，还妨碍了港澳办众多干部的工作。

听了鲁平的话，我已不敢再有任何要求，只是又谈了半个多小时。

事后港澳办副主任陈滋英向我透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鲁平是四川人。我笑称若早知道（我是事后向他要简历的）一定与他认老乡，难怪在他身上看到我们四川人的真、四川人的犟，还有四川人的直肠直肚。

一年多过去了，我回顾对鲁平的采访，仍觉珍贵。筹委会期间，他只接受了我一个人的专访，而筹委会的历史将载入史册。我从来不敢为自己在筹委会期间的工作作任何评价，但为如鲁平等筹委会委员写下的专访，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些文字记录，他们在这历史时期之工作、经历、心态，对将来回顾这段历史，起码留下了文字记载。

我异常珍惜此次访问，也非常感谢鲁平先生的真情剖白。筹委会的历史将永留人间。

原来是同行前辈

1952年，“国母”宋庆龄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对外宣传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从该杂志创刊起，鲁平就在那里任编辑，直至1966年升任副总编辑，前后十四年。

若不是文化大革命，可能还会干更长时间；也可能他不是今天的鲁平。

没想到是同行，又是前辈。

据悉，《中国建设》由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亲自管，他很

关心这本刊物，而具体工作则由廖承志管，隶属国家外文出版局。宋庆龄与美国关系非常好，在美国有很高知名度，以她的名义，该杂志可进美国，公开在报摊发售；杂志的基调由中央定，力求多样化宣传新中国的成就；服务对象为欧美国家中间读者，因此更要做到有针对性，不讲空话，用事实说话。鲁平说：“在国外所有的对外宣传刊物中，我们这本杂志销路最好，比较受欢迎，除英文版外，后来又发展了法文版、德文版，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葡萄牙文版。”

1953年，杂志社便迁往首都北京。

历史有时真会开玩笑，我此时所指的是那段人妖颠倒的历史。读者可曾想到：广为港人熟悉的共和国港澳办原主任，竟然曾是“反革命分子”，且长达十二年之久。

往事确实不堪回首，鲁平陷入深深的痛苦回忆中，平时见惯他的坚毅神色与自信语气已被凝重的表情与悲愤的话语所替代，他说：“我始终感觉到非常内疚。”他的内疚是因为高堂与稚子在文革中跟着他受的苦。

对鲁平的性格、为人，过去我是表面的观察，完全不知道他的过往。此次长谈，他对过去聊了许多，可惜这段历史他始终不愿意发表，本已成文，但为尊重其本人，我只能简单带过。而听了他的叙述，我终于明白了鲁平何以有他的性格、他的为人。我对他说：“你因为有很不简单的经历，所以才有如此坚定的人格。尽管我不可能完全看清你面对谁人会怎样，但我知道，不论你面对谁，哪怕你的上司，我绝对相信：你还是你。”

为人子、为人父的鲁平经历了文革——一生中最刻骨铭心难忘的日子，他陷入痛苦的回忆中，我也受到感染，心想：幸亏他熬过来了。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他才于1978年获“解放”。

总感到鲁平的故事很悲愤、极震撼。我告诉他：“我做记者

二三十年，以我之年龄、资历，现在任何事已难以引起我激动、兴奋。”

然我心里明白，此次采访，鲁平动了真感情，他之叙述使我受到极大震撼、感染。当天采访后，回到酒店，那一个个动人故事、那字字血泪、那痛苦经历、那艰辛回忆，像电影故事般在我脑海里一幕幕重现，深夜至凌晨两三点钟仍无法入睡，我知道自己真正被感动了。

平时我所见之鲁平，仅为身居高位在官场中的一面，听罢他对往事的回忆，虽只有短短的三个多小时，却让我逐渐看清他高官背后的另一面。这一面显示了一个人、一个很感性的人之真；一个很有感情的人之诚。

身居高位多年，他却给我讲了个意想不到的故事。

文人做官，难！

“回过头看我这辈子，我这个人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指任高官），绝对不适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起码当时是这样的反应。

1978年，鲁平从农村回城了，他不愿再回到原单位，那里太令他伤心了。

廖承志提出让他参加筹组港澳办。最开始在北京华侨大厦租了两个房间，四位老大姐加上他，开始了国家专责港澳事务的工作，他说：“这也是缘，那时我最年轻，一千九百九十九年。”

我说：“我不相信干了十九年港澳工作，并官至国家专责港澳工作的最高级官员，居然说自己‘绝对不适合’。”他忙说：“真的，真的！”接着，他以异常迟缓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得去讨好什么人，我与任何上级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只有工作关系。”我听得很清楚，高兴地说：“你看，我

没有看错人。”

“钱其琛副总理的家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听他继续说：“我根本没去过，要去就到他办公室谈公事，不谈私事。姬老（港澳办前主任姬鹏飞，鲁平前任）的家，我每年过春节去向他拜年，因为他是老前辈。历来都这样，我从未到领导人谈私事，我总觉得没这个必要。如果党要用你，自然会安排你，如果觉得你不适合这份工作，说明你这人不应在这个位置上。我一向以来都这样，一辈子没有任何私人关系，我就是凭党性工作。”

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自己又是知识分子，是否知识分子的清高？以这种性格评价一个人是高尚的，然在“官场”上打滚，他说的不无道理：“但回过头看，我的确不适合做这工作。”听他再三强调，我不解：“我不理解这‘不适合’，就算你与领导没私人关系，但上级既已安排你，为什么说不适合？”他认真地说：“我不适合，这工作太复杂了，我这个人有点性格，有的人很怕我，但是我这个人是很有感情的。”

此话我相信，吃过这么多苦的人，内心世界充满感情。又听他说：“一个有感情的人，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我有同感，特别是文人从政、做官，难！但我觉得：“你不是干得满好的吗？”他自顾自说：“一个做政治工作的人，一定要很冷静，不能动感情，所以我说我不适合做政治工作。”

唔！似满有道理！

若能回头重新走

“若能回过头来重新走。”他若有所思地说：“我还是愿意搞我的‘工’，因为我原来是学工的。”

从中学起，鲁平即入工业专科学校，上大学读的也是工科。据悉当年有位英国犹太人雷氏德在上海发了大财，又没结

婚，去世后留下大笔遗产没人继承，后人使用这笔钱建立基金办了雷氏德工业专科学校，有大学、中学。鲁平介绍：“这间学校非常好，师资很强，全是英国老师。学生从初中一开始，所有科目都接受以英文教学。学校规模不大，收的学生很少，因此很难考，我是自己考进去的。”

哈哈，我觉得好笑，我是不信命的，但世事当中的许多巧合却又出人意料。当初谁又会想到这位接受英国人教育的孩子，日后专与英国人打交道，处理中港、中英问题呢？在香港回归的后过渡期，还时时与港、英“对着干”呢？可能这就叫命，有时真是不得不相信这似乎是命中的安排。他说：“英国人不像美国人，当时美国教会在中国办了许多学校，几个大城市都有教会学校，但英国人就办了这间学校。”哈！这所学校就让你进去了？他答：“正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了租界，把学校的所有英国教师都关进了集中营。学校由日本人接手，成天向学生灌输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等思想，书念不下去了。鲁平从初一即入此校，原想在本校念完高中，再升大学，这都不用考试。

然念至高二就非得转学了。他介绍：“雷氏德学校的学生进学校后先打好英文基础，越往高年级念越专。读至初中三年级先淘汰一半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上了高中的学生，已没法转往别的学校念书，因为连化学元素、三角几何的名称，学生只会用英文表达。当时只有圣约翰大学是惟一的英文大学，因此我们雷氏德学校的学生只能考圣约翰。”

鲁平考的是农科，这样，他对工科的爱好，甚至若能回头也要从“工”的愿望，则要回到他选择初中就读学校的很远年代。

了解外界之工具

听他这段经历颇有趣，在英国人办的中学，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学校有不少地下党员；还办有学习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学习班，收听苏联电台及每天到苏联俱乐部取回的苏联塔斯社新闻；以及有苏联小说、电影看。这样，鲁平早于中学时代已有机会接受共产党的外围教育。他开始学俄文，并于入大学后的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看苏联的东西多了，影响也深，苏联的重工业、集体农庄见得最多，不禁感叹：“集体农庄真好！”那时他觉得中国要强大首先需解决农村问题，从而抱着一定要在中国建集体农庄的理想。理想归理想，现实是现实，鲁平在大学的课本里或图书馆的资料中一点都找不到有关苏联、集体农庄的介绍，全是美国的一套，如电气化养鸡等，一则自己学农的理想没法实现；二则自己之所学与当时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因为农村连电尚没有，何来电气化，因此他为自己学的一套完全用不上而苦恼。

“我现在仍喜欢工科。”已过几十年，又届退休年龄仍未改初衷，鲁平介绍，学校让学生自己动手修自行车、汽车，他们把汽车拆散后，又把零件一件件组装，还学开机床、刨床。他说：“由于有这段经历，所以后来我在干校当电工时，这些技术都派上用场。”

到干校后期，各方管制较松，晚上闲来没事，他便自己动手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装好一部送一部给人。那时的环境，谁拥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可不得了：听新闻是它，听样板戏也是它。根本是当时惟一自娱和了解干校以外世界的工具。

“我们‘牛鬼神蛇’和‘反革命’，什么消息都不让知道，连《人民日报》也不让我们看，包括林彪叛逃事件也不让我们知

道。”他为自己安装了一台带短波的收音机，所以他说：“实际上我早已从短波电台中收听到了。”有一天参加劳动，让他们把干校门口的两条大标语涂掉，那是林彪书写的“大海航行靠航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他当然知道原因，但故意问：“为什么要把副统帅的标语涂掉呀！”人家的答复是：“让你涂你就涂，问那么多干啥！”哈！讲到颠倒是非年代叫人啼笑皆非的往事，鲁平才逐渐轻松起来。

坚持讲实话不易

人们都知文革时很多冤假错案，在当时的环境下，讲真话往往要付出代价，那时的人要么不说话，有时要说真话并不那么容易，而鲁平说：“那时我对冤假错案坚决顶住，一再的‘逼供讯’我坚持讲实话，就算再受委屈，被屈指为罪魁祸首仍讲实话。幸好当时他们对我还算是较客气的，没把我抓进去。有时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能够钻研问题，比如当年安装收音机，如碰上收音机没装好或是坏了修不好，我可以一夜不睡，通宵达旦地无论如何找出原因，直至完全修好为止，修好了我也很高兴。反正干什么我都有一定要钻研到底的精神，不管多难，也要找各种各样的资料，自己去看、去研究，搞出个结果来。所以我觉得如果学工科，搞工业方面工作，可能会干出些名堂。”

这些大概印证了我所说的，他具有四川人的犟，四川人的直肠直肚。

而事实上他从政，在港澳办也干出了名堂，但他仍很坚持：“我还是不宜干这工作。我是真心诚意想在香港贯彻‘一国两制’，使香港繁荣稳定；我的的确确想为香港人做点事；把香港搞好了，也为国家好，两者不矛盾。有人把两者对立起来，我认为不对立，就因为这，便有人感到我为什么老替香港人说话，而